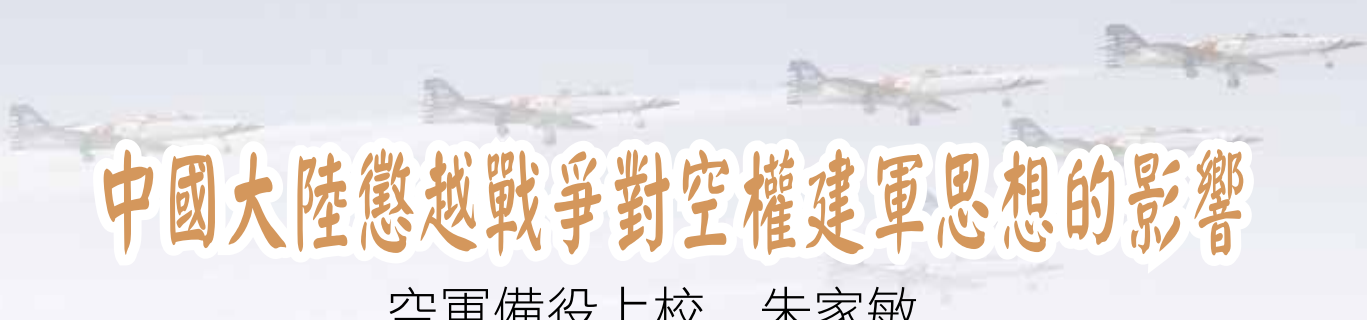




中國大陸懲越戰爭對空權建軍思想的影響

空軍備役上校 朱家敏

提 要

李德哈特(B·H·Liddell Hart)在《為何不向歷史學習》書中說到：「研究歷史就是要發現『真實』，發現所曾經發生的事實真相，並同時嘗試發現此種事實為什麼發生的原因。換言之，即尋找真相之間的因果關係」。

對於研究中國大陸懲越戰爭經驗教訓言，非常吻合李德哈特所強調「找出歷史事件因果關係的真相」，使中國大陸面對未來局勢的改變，而變得更加「聰明」，將空軍由「人民戰爭戰略思想」改朝向「現代條件下的人民戰爭戰略思想」歷程，開啟中國大陸空軍邁向現代化的旅程發展。

關鍵字：人民戰爭戰略思想、現代條件下的人民戰爭戰略思想、因果關係、懲越戰爭

前 言

1950年中國大陸人民志願軍加入了韓戰，以為憑著高昂鬥志、紀律與游擊戰的優勢，將可抵擋住美國的軍事。事實上，中國大陸的地面部隊遭受到美國空軍的轟炸重擊。¹因此，使中國大陸體會到在面對美國強大火力與空權聯合機動作戰壓制下，中國大陸的軍力不僅缺乏指揮、管制、通信的能力，更無法打擊到部署海外美國的兵力，未來將面對著是殲滅戰爭(annihilation)，所以一改過去游擊戰的誘敵深入的防禦戰爭，取而

代之的是朝向聯合機動作戰的型態。²在強化常規武器裝備發展的同時，也不遺餘力發展核子武器。如同1958年毛澤東在軍委擴大會議中所說：「我們發展核武，不能因此否定常規武器。這是因為，從歷史經驗來看，我們用低級的、落後的武器打敗過用高級的先進武器裝備起來的強大敵人，從現實可能來看，我們將來的反侵略戰爭，將有大量民兵參加，只講導彈、原子彈、氫彈，民兵是否也能每個人發一個原子彈呢？所以，洋的、土的要結合，常規武器加特種武器」。³

孰料，歷經大躍進、文革等影響，中國

1 Dr. Jeffrey Record, "Thinking about China and War", Aerospace Power Journal- Winter 2001. <http://www.airpower.maxwell.af.mil/airchronicles/apj/apj01/win01/record.html>.

2 Ka Po Ng, Interpreting China's Military Power (London & New York: Frank Cass, 2005), pp.47-49.

3 胡哲峰，《毛澤東武略》(臺北：慧明文化，2003年)，頁490。



大陸並未落實建軍理念，在歷經韓戰後的生息養兵，1970年代末期因邊界問題與越南產生過節，更因越南與蘇聯在1978年11月2日，簽訂「蘇越友好條約」，形成南北夾擊箝住中國大陸之勢，後又因越南於1978年12月入侵柬埔寨，形勢更不利中國大陸，⁴遂在「早打、大打」的戰爭指導原則下，⁵於1979年2月17日發動懲越戰爭，想以優勢兵力入侵越南，教訓越南，可是在缺乏訓練情況下，又遇到現代機械化的對手，再次遭受到挫敗而損失慘重。3月16日在攻下諒山基地後，即息鼓收兵，結束此次戰爭。綜觀此次戰爭所衍生建軍備戰的問題，雖然造成戰場上不如預期的效益，如同鄧小平所說：「軍事上的成就是其次，主要是教訓越南，不要得寸進尺，欲取欲求」。而將「人民戰爭思想」調整為「現代條件下的人民戰爭思想」。⁶著重軍事現代化整備，以因應下一場戰爭的來臨。

戰爭起因

一、中越關係的轉變

1960-1970年代美越之戰期間，中國大陸不僅從經濟、物質上支援越南，更派遣解放軍進入越南幫忙維持補給線，而且中國大陸估計從1950-1978年對河內的經援總值超過

200億美元；1975年，中國大陸顧慮到日益增加的援助將提供越南日後建立起威脅中國大陸的軍事力量，因而拒絕河內有關增援計畫的請求。原因是，1975年9月，越共總書記黎筭訪問北京，進行一連串會談之外並要求額外增加經援，中國大陸並不同意。會後，黎筭隨即前往莫斯科，取得了為期5年，總達30億美元援助的承諾。1976年，當中國大陸並未照越共總書記黎筭訪問北京的要求增加援助額度，僅以2億美元來援助河內，黎筭外長遂公開批評中國大陸是「有系統的敵意政策」，致使中越關係開始逐步退化。

1976年9月起，四人幫執政，中越邊界紛擾有增無減，雙方的關係遂開始惡化；直至，1978年12月，越南入侵柬埔寨。⁷中國大陸在忍無可忍情況下，鄧小平說：「你不知道老虎發威的反應後果，是因為你沒有搔到老虎的痛處。」⁸於是尋找時機，準備給越南一個下馬威。

二、蘇越關係的轉變

(一)中、蘇、越彼此關係的變化

1950年2月24日，中蘇雙方簽訂期約長達30年的「中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中國大陸在蘇聯的支援下，國防軍備有顯著的成長，及至1969年3月2日，雙方因珍寶島邊界衝突而大動干戈；事後各退一步，但對邊界

4 艾里曼(Bruce Elleman)著，李厚壯譯，《近代中國的軍事與戰爭》(臺北：時英出版社，2002年)，頁493-494。

5 中國大陸年報編輯委員，《1986年中國大陸年報》(臺北：中國大陸研究雜誌社，1986年)，頁3-6。

6 Gerald Segal, *Defending China* (Oxford: Oxford Univ. Press, 1985), pp.221-223.

7 艾里曼(Bruce Elleman)著，李厚壯譯，前揭書，頁491-493。

8 Gerald Segal, op. cit., p.211.

所存在的困擾一直沒有妥善的解決，中蘇雙方遂在邊界地區駐有重兵把關。

1978年2月24日，莫斯科提議中蘇雙方另訂一協議以取代即將到期的「中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北京拒絕此提議。此時期，越南於1975年終止與中國大陸友好關係而朝向蘇聯靠攏，其目的在於利用聯蘇以削弱中國大陸在東南亞地區的影響力。

1978年8月，蘇越合作關係更加密切，越南境內竟然有4,000多名蘇聯顧問；9月，蘇聯飛機、飛彈、坦克及軍需品裝備陸續進駐越南；11月2日，蘇越雙方簽訂「蘇越友好合作條約」，准允蘇聯軍隊使用越南的「機場與港口」；而越南政府事後說：「此條約目的在阻止中國大陸冒進主義者的行徑」。職是之故，從北京眼光來看，蘇聯企圖從外交上包圍中國大陸，假使政策一旦成功，蘇聯就可從南方側翼包圍中國大陸，達成南北夾擊箝住中國大陸的目的。⁹中國大陸不得不思迫在眉睫的威脅應變之道。

(二)蘇聯覬覦越南軍要地理位置

當蘇越雙方簽訂「蘇越友好合作條約」後，蘇聯宣稱：「越南如今已成為社會主義在地球的這一地區的可靠堡壘」。因為，莫斯科需要的是一個能爭霸東南亞和亞洲的「前哨站」。東南亞扼據連接太平洋和印度洋的戰略通道，又是戰略物資的富饒產地，

早已是蘇聯社會帝國主義和美帝國主義爭奪的目標。所以蘇聯亟需具有從本土太平洋艦隊基地到印度洋的漫長航途上，占一有利的中繼站補給基地，此就是蘇聯垂涎越南的軍事基地，特別是美國修建的現成金蘭灣巨大軍港的緣故。蘇聯需要越南這個「鞏固前哨」，就是要進一步加強在亞洲太平洋和印度洋地區，俾能與美國爭奪這個具有重要戰略意義的要地。¹⁰

而金蘭灣位於越南中部慶和省，它向有世界「最佳天然深水港」之譽，也是東南亞最好的海、空軍基地之一，有「東南亞心臟」之稱。它背靠中南半島，東臨南中國海。距中國大陸海南島約400海哩，離廣州780海哩，位於巴士海峽(臺灣島與菲律賓之間)至麻六甲海峽航線的中心，也是新加坡至香港航線的中心。從1965年起，美國花了近兩年時間，耗費鉅資，動用大量人力，對金蘭灣進行大規模的擴建，使它成為美國在越南戰爭期間「最大的海、空軍基地」，也是「最現代化的補給中心」。越戰後，美軍撤出中南半島，金蘭灣港口設備完整無損，蘇聯基於向東南亞侵略擴張的需要，對這一良好的港口早已垂涎三尺，目前不僅港口內停滿了蘇聯艦船，亦在金蘭灣建立了導彈基地，據聞有六枚遠端導彈瞄準中國。¹¹

三、懲越戰爭的原因

9 艾里曼(Bruce Elleman)著，李厚壯譯，前揭書，頁468-496。

10 〈從越南當局反華看蘇聯的戰略意圖〉，《解放軍報》，1978年8月2日，<http://db1.greatman.com.tw/jfbweb/AtContent.asp?sely=1978&selm=8&seld=2&selp=14&Report=139>。

11 魏正廉，〈北極熊覬覦金蘭灣〉，《解放軍報》，1978年10月21日，<http://db1.greatman.com.tw/jfbweb/AtContent.asp?sely=1978&selm=10&seld=21&selp=20&Report=139>。



面對周遭環境險峻，學者張保民指出，蘇越防禦條約，是企圖從南方來威脅、箝制中國大陸。鄧小平也承認蘇越軍事同盟，讓中國大陸深以為憂。而中國大陸官方也聲明說：越南有如蘇聯插在中國大陸背後的一把刀。¹²

對此，中國大陸先行訪問美國，尋求支持，以期在外交上制衡蘇聯後發動懲越戰爭，以脫離蘇聯社會主義；¹³此時期，1978年12月25日，越南入侵柬埔寨。中國大陸遂於1979年元旦與華府建立正式外交關係，訪美期間，告訴卡特總統說：「中越之戰，是要打亂蘇聯的戰略部署」。而卡特總統對鄧小平保證說：「美國對於中國大陸即將發動懲越戰爭給與道義上的支持」。¹⁴隨後又訪問日本等亞洲國家，在獲得美、日等國支持，是可忍，孰不可忍情況下，於是爆發1979年2月17日懲越戰爭，其目的就是要懲罰越南不要得寸進尺，予取予求；同時也將展現出中國大陸實力，而告訴世人中國大陸並非一隻紙老虎。¹⁵

其次是，鄧小平復出以後，中國改革開放的藍圖已經在他心中草繪而成，要實現這個藍圖必須在黨內樹立絕對的權威，不得不

打。最後是，拉美打蘇，援取美援，以利經濟改革開放。因為中國要改革開放沒有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的援助是不可能的。

開戰後，美國對中國的經濟援助、技術援助、科技援助包括軍援和資金源源不斷地湧到中國。中美之間的蜜月長達十年之久，一直到1989年6月4日才劃上句號。這一仗給中國帶來了大量的時間、資金與技術。而這一切，更確保了「蘇東波」之後的中國繼續挺立。厥功甚偉。甚至可以這麼說，中國的改革開放的第一步就是從這場戰爭中邁出去的。從這個政治層面的意義上來看，懲越戰爭對中國改革開放的貢獻影響深遠。¹⁶

戰爭經過

中國大陸於1979年2月15日，宣稱要對越南發動一次有限戰爭，共約28萬人員，便分東、西兩線分別有計畫的前進越南邊界準備進攻；同時為了避免蘇聯的干預，還警告蘇聯，將對蘇聯展開全面戰爭。為此，將多達150萬部隊(含一些精銳部隊)駐防中蘇邊界，下令軍隊全面進入緊急備戰狀態，防範蘇聯；蘇聯方面，派遣數艘海軍艦艇開往越南，同時還空運武器裝備支援越南；¹⁷越共方

12 艾里曼(Bruce Elleman)著，李厚壯譯，前揭書，頁500-506。

13 劉亞洲，〈道德與信念〉《中國報導周刊》，2005年05月28日<https://translate.google.com.tw/translate?hl=zh-TW&sl=zh-CN&u=http://www.china-week.com/html/2498.htm&prev=search>，摘引自2015年10月20日。

14 艾里曼(Bruce Elleman)著，李厚壯譯，前揭書，頁498-500。

15 Gerald Segal, op. cit., pp.211-223.

16 劉亞洲，前揭文。

17 艾里曼(Bruce Elleman)著，李厚壯譯，前揭書，頁503。

面，部署三個師分守老街、高平、諒山等地區，主力部隊在後，俾避免主力部隊在作戰初期即為中國大陸優勢軍力所捕捉；僅以少數正規軍堅守據點，以配合民兵與中國大陸軍隊斡旋，企圖能誘敵深入後再與中國大陸決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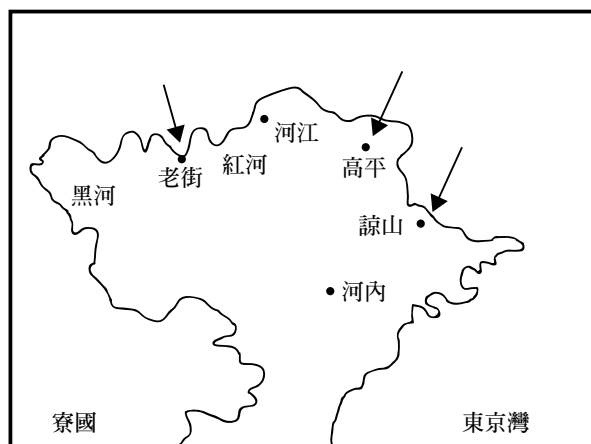
1979年2月17日晨6時25分，中國大陸在坦克和砲兵之支援下，自廣西和雲南的邊界，分別向越共的萊州、黃連山與廣寧等省發動攻擊，由於事出突然，致使越共第一線所構築工事全毀，順利奪下諒山附近的同登。

2月19日，中國大陸軍隊與越共在老街、高平、諒山等地區進行激烈戰鬥；據報導，越共曾在諒山地區使用某種化學戰劑，造成中國大陸部隊有些傷亡。2月20日，中國大陸對外宣稱，自17日對越共實施「懲罰性教訓」戰爭以來，其軍隊已重創越共軍隊，並攻陷了老街。2月22日，蘇聯駐河內軍事武官特拉科夫上校楊言蘇聯將依蘇越條約履行義務；然而，在其它場合，蘇聯外交官卻表明，蘇聯不會介入，這場戰爭將維持有限的衝突戰爭。2月23日，中國大陸在攻下老街之後，目標指向諒山。2月24日，越共派遣突擊隊進入廣西境內，企圖破壞南寧至諒山鐵路，以切斷共軍部補給線，但未成功。2月25日至28日，雙方軍隊在諒山城郊的高馬山激

戰，不久，高馬山被中國大陸攻陷，越共開始從諒山疏散居民撤退。

3月2日，中國大陸進入諒山城，戰鬥至此，老街、高平、諒山等主要邊界城市皆被中國大陸攻陷。3月4日，諒山失守，越共驚惶萬狀，正預備進行「全國總動員」，出動百萬軍民搶修工事。然而3月5日清晨中國大陸占領諒山後，便宣告鳴金收兵；另經過十餘日的戰鬥，終於在3月16日完全撤退，檢討中國大陸在此役中傷亡約六萬三千人(懲越作戰簡圖一)。¹⁸

懲越戰爭失敗原因



圖一 1979年2月17日—3月16日懲越戰爭

資料來源：施道安(Andrew Scobell)、伍爾澤(Larry M. Wortzel)、蘿莉·勃奇克(Laurie Burkitt)著，李育慈譯，《解放軍75周年之歷史教訓》(臺北：國防部史政編譯室，2004年)，頁412。

18 施道安(Andrew Scobell)、伍爾澤(Larry M. Wortzel)、蘿莉·勃奇克(Laurie Burkitt)著，李育慈譯，《解放軍75周年之歷史教訓》(臺北：國防部史政編譯室，2004年)，頁411；周玉華，〈匪越邊界戰爭之經過與對國軍教戰之啟示〉，《三軍聯合月刊》，第18卷12期(1981年2月1日)，頁65；上官戟主編，《中國大陸對外戰役》(臺北：洞察出版社，1987年)，頁66-76；艾里曼(Bruce Elleman)，李厚壯譯，前揭書，頁502-504；Gerald Segal, op. cit. p.213.

在歷經不到3週的戰爭，中國大陸即在舉世訝異下自越南撤軍，事後雙方的邊界仍存在著爭端。檢討此役的得失，咸認懲越軍事作戰是徹底的失敗，如同學者對中國大陸發起戰爭動機的看法：中國大陸出兵教訓越南，是在「早打、大打」的戰爭指導思想下所發動。¹⁹寧可早打，而不要等到時不與我，蘇越關係生米已煮成熟飯，蘇聯若在東南亞建立好一個立足點，就能在南疆側翼包圍中國大陸，適時將受蘇聯脅迫。或許就如學者專家研究的觀點：中國大陸領導人在判定勝利與否，並非取決於戰役演變或結果對軍事、戰略或政治造成的直接影響。此種標準意指任何情勢只要未減損或破壞掌控大局的能力，便可能被中國大陸視為勝利。這說明中國大陸為何在尚未贏得明確的軍事、戰略或政治結果之際，便於1962年終止中印戰事以及1979年終結懲越戰爭原因；這意味著，北京寧可願意甘冒經濟損失與混亂的風險來戮力遂行戰役，以掌控大局。²⁰或許正如鄧小平所說：「我們不介意懲越戰爭是否能達成軍事上的目標，這不是那麼重要的」。²¹顯然，政治上的意義大於實質軍事挫敗上的難

堪。

一、軍事作戰失敗原因

何以中國大陸未能如願完成懲越戰爭的戰略構想呢？中國大陸雖經過韓戰的洗禮，體悟到史達林就二次大戰初起蘇聯所面對窘境時說：「在現代戰爭中，沒有坦克、沒有足夠的航空兵在空中做掩護，步兵是很難作戰的」。²²換句話說，中國大陸此時此刻才認知到「朝鮮戰爭中的決定性力量是空中威力」。²³撫今追昔，缺乏制空的協防，不僅是韓戰挫敗，亦是中國大陸懲越戰爭心中的痛楚。中國大陸當局是如何來看待這場虎頭蛇尾的戰爭呢？

(一)缺乏空軍掩護與支援

中國大陸專家在事後檢討懲越戰爭經驗教訓時雖未述及有關空優或空中密接支援的問題(此項任務迄今從未真正有效執行過)。²⁴儘管越軍執行數次空投再補給任務，以支援前線守軍，但中國大陸絲毫未論述到是否希冀透過空中補給線或建立空優來阻絕敵軍補給作為。²⁵造成此種一度空間的線性作戰後果，不僅反映出中國大陸空軍未具備有密接支援的空對地聯合作戰能力；²⁶更因為中國大

19 中國大陸年報編輯委員，前揭書，頁3-6。

20 施道安(Andrew Scobell)、伍爾澤(Larry M. Wortzel)、蘿莉·勃奇克(Laurie Burkitt)著，李育慈譯，前揭書，頁327-328。

21 Gerald Segal, op. cit., p.211.

22 董文先，胡思遠，《杜黑理論與空軍》(北京：軍事科學出版社，1995年)，頁107。

23 同前註，頁103-107。

24 甘皓森(Roy Kamphausen)、施道安(Andrew Scobell)編著，黃文啟譯，《解讀共軍兵力規模》(臺北：國防部史政編譯室，2010年)，頁291。

25 施道安(Andrew Scobell)、伍爾澤(Larry M. Wortzel)、蘿莉·勃奇克(Laurie Burkitt)著，李育慈譯，前揭書，頁429。

陸戰機受限於航程短，受限能力所不及，無法從事戰場空中掩護與偵察所致，²⁷致使共軍時常會遇到不預期的敵地面部隊，在缺乏火力支援下，往往增加傷亡。²⁸

(二)大公社、大躍進、文革等政治風暴影響

由於大公社、大躍進的失敗(1950-1960)，造成國內經濟惡化的災難，毛澤東遂於1958年冬自動提出退居二線、1959年底正式退居幕後；由於深恐資本主義及反社會主義(反左)傾向的蔓延，地位不保，江山流失，遂於1962年9月24-27日在「八屆十中全會」中提出「四清五反的階級鬥爭」，開始展開黨內清剿的攻擊活動，以此向大躍進時反對他的劉少奇等人展開攻擊，俾使其及同路人得以重新掌權；1965年中在林彪、江青(毛的第四任妻子)及其他同路人的支持下，毛澤東再次掌權，並開始實施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運動，利用軍隊及學生來支持這項運動，對劉少奇、鄧小平展開無情的攻擊。在國防部部長林彪的支持下，數以百萬計的學生變成了紅衛兵，導致整個國家的退步，粉碎了黨組織的運作。²⁹

文革期間，中國大陸厲行剷除異己並結

黨營私擴大鬥爭過程，因為此時期毛澤東表示具備政治觀的人比武器重要：認定將現代化武器與訓練視為狹義的軍事觀。為此，部隊均參與政治學習而荒於訓練。如同西方學者喬治·桑塔雅納所說：「狂熱存在於一人遺忘原先目標後不斷重複的相同作為。」³⁰鎮日的狂鬥與政治洗腦，荒廢訓練，致使解放軍優良傳統慘遭破壞，造成：³¹

1.教育程度低落

1950-1960年代進入解放軍服務，爾後參加懲越戰爭的軍官中，極少有人接受過初中以上的教育。

2.缺乏訓練

1978年解放軍報曾刊登篇文章報導：軍事訓練並不嚴格，甚有時毫無訓練，有些士兵已在軍中服役數年卻從未碰過槍，有些幹部則無力領導幹部。

3.缺乏戰術戰技訓練

受「政治正確」的影響，因此，解放軍極少士兵具備有現代化戰爭作戰經驗，以致作戰準備不足。再者，解放軍極少舉行野戰訓練，使得低階軍官未擁有足夠的軍事技能。此外，部隊素質低落，戰術效能不彰，協調性也不足；解放軍之戰術類似於過去的

26 Ka Po Ng, op. cit., p.65.

27 Gerald Segal, op. cit., p.216.

28 艾里曼(Bruce Elleman)，李厚壯譯，前揭書，頁504。

29 Kenneth Allen等著，李貴發譯，《邁入21世紀中國大陸空軍》(臺北：空軍總部，1997年)，頁10-11。

30 施道安(Andrew Scobell)、伍爾澤(Larry M. Wortzel)、蘿莉·勃奇克(Laurie Burkitt)著，李育慈譯，前揭書，頁475；唐德剛，《毛澤東專政始末》(臺北：遠流出版社，2005年)，頁142-171。

31 施道安(Andrew Scobell)、伍爾澤(Larry M. Wortzel)、蘿莉·勃奇克(Laurie Burkitt)著，李育慈譯，前揭書，頁415-473；艾里曼(Bruce Elleman)著，李厚壯譯，前揭書，頁504。



步兵集中火力攻擊，而非現代化軍隊的火力與機動戰術。

4. 通信設備不良

中國大陸無法肆應現代化戰爭的另一個原因乃是在通信傳輸系統上特別弱，由於通信不良，有些連與排和主力部隊失聯；此外，利用人海戰術之大型編隊作戰，不適於山野林立的越南戰場，更無法從事通信連絡、協調，僅靠著傳令兵逐師逐地傳達，緩不濟急，遂造成重大傷亡。

5. 指揮混亂

中國大陸於大躍進時期，領導高層顧慮軍方將成為危險的精英階級，遂於1965年中期廢除軍銜制。因為，1955年師的軍銜制不符合「軍隊的光榮傳統，以及官與兵、高階與低階、軍與民之間密切關係」。取消有助於消弭名利之別，使軍官與士兵、農工平起平坐，並有益於進行意識形態改造，鞏固軍隊為黨和人民全心奉獻理想。

事實上，中國大陸未實施軍銜制後，亦未配有識別徽章，以致在敵方火炮攻擊下，造成戰場群龍無首而更加混亂，直到1988年實施新的軍銜制，才解決此問題。

6. 後勤不足

鑒於解放軍係透過固定場站進行支援補給，以致補給遠離基地作戰的大型部隊便成為重大難題。而中國大陸遠征部隊編制並未

設有機動運輸團或營，來從事後勤補給。遂使懲越戰爭期間，中國大陸30個師每日需要1萬5,000噸糧秣，然實則上現有卡車是用來載運砲兵、重裝備牽引車，而非補給車，且卡車、裝甲運兵車等機動車輛數量又不足，故非但未能發揮人力優勢，更無法滿足補給需求。致使戰爭期間有的士兵穿著同一雙鞋和同一套衣服逾10日之久。其次，中國大陸在開戰不到一週(戰火最猛烈時期)，便開始呈報糧水短缺，在諒山附近重要高地戰鬥的部隊即通報指出，上級部隊已數日未送糧，導致其斷糧2日，事實上，中國大陸後勤補給線離作戰區僅30多公里，顯見後勤系統不合格。

基於上述原因，遂使中國大陸無法在1979年懲越之役中成為有效打擊勁旅。³²

二、空軍用兵準則的失誤

當鄧小平1967年遭文革整肅，於1975年復出擔任參謀總長，即開始思考有關共軍作戰準則問題。1975年6-7月間，與葉劍英共同主持為期3週的中央軍委擴大會議，會議中，鄧小平首次公開批評「人民解放軍」是「腫、散、驕、奢、惰」的軍隊；而共軍的主要機構則是「軟、懶、散」的單位。³³1977年，鄧小平更憂心如焚的指出：「中國大陸軍隊面臨兩個不夠的問題，一個是各級幹部指揮現代化戰爭的能力不夠；另一個是部隊

32 施道安(Andrew Scobell)、伍爾澤(Larry M. Wortzel)、蘿莉·勃奇克(Laurie Burkitt)著，李育慈譯，前揭書，頁421。

33 沈大偉(David Shambaugh)著，高一中譯，《現代化中國大陸軍力》(臺北：國防部史政編譯局，2004年)，頁92-93。

打現代化戰爭的能力不夠」。³⁴此顯示出鄧小平看出中國大陸軍力的體態臃腫的龐大與不堪。

此期間，中國大陸人民解放軍於韓戰後吸取美軍直搗黃龍將兵力推進到大陸邊界，即強調「積極防禦」的作戰思想，是將兵力屯守在邊界上，以產生嚇阻的能力，遂使中國大陸於1965-1973年間，將近有32萬名「人民解放軍」部署在越南境內從事防空等工程建構；1975年中蘇交惡，蘇聯對中國大陸的威脅劇增，毛澤東再次修訂「積極防禦」，是偏向在傳統、被動及講求縱深的人民戰爭戰略，即「積極防禦」是「透過攻勢防禦或決定性交戰的防禦」的軍事戰略，是一種「誘敵深入，俾利用地理優勢即人民力量來抵消敵人技術的優勢」。1977年，鄧小平重新加以界定「積極防禦」的構想，也就是上述毛澤東所說的「誘敵深入的守勢作戰」構想。³⁵

事實上，毛澤東「人民戰爭戰略」準則概念特質是政治超過專業(professionalism)；人為因素超過軍事硬體建設；軍事訓練只是政治的妥協；致使1971年陸軍沒有一個師是受過完整訓練；在缺乏作戰訓練的準備情況下帶給了人民戰爭1979年懲越失敗的災難。³⁶

由於蘇聯在1960年停止對中國大陸一切

軍事援助以後，中國大陸只好自己設計製造戰機，受限於經驗及與西方隔絕的影響，只能依賴現有戰機機型來從事研究發展。事實上，中國大陸空軍幾乎完全依賴1950年代蘇俄所設計生產的飛機，於1960至1970年代，經局部修改或自行製造的飛機，受1958年大躍進、1960年中蘇分裂及1966-1976年10年文革的影響，中國大陸空軍現代化的發展完全中止；1960年代對空軍組織及運作持續的破壞。尤其空軍在文化大革命期間，任何與學術和專業有關的事物，皆遭吞噬，破壞殆盡。³⁷使50年代所累積的建設僅剩一個空的殼子而已，幾乎沒有實質內涵。當中國大陸嘗試著要自力生產幾型新一代的飛機，各飛機製造工廠卻因文化大革命的衝擊影響到飛行安全而停頓，此時，因空軍停止對飛行及維修人員的訓練，而導致嚴重的飛機故障及失事，也因此造成文化大革命期間所仿製的飛機毫無品質可言。³⁸

總結60年代後中國大陸空軍，蘭德公司研究中發現1960年代，中國大陸空軍的發展已因中蘇關係的破裂而大受影響，中蘇分裂嚴重傷害到中國大陸航空部隊的能力，已無法擁有現代化的空中戰力；而文化大革命更減緩其成長，因為文化大革命期間的政治運動加速人員訓練及作戰能力的衰退，嚴重的

34 孫科佳，《中國特色的軍事變革》（北京：長征出版社出版，2003年），頁197。

35 沈大偉(David Shambaugh)著，高一中譯，前揭書，頁89-95。

36 Ka Po Ng, op. cit., pp.58-59.

37 羅傑·克里夫(Roger Cliff)、約翰·費(John Fei)、傑夫·哈根(Jeff Hagen)等著，黃文啟譯，《21世紀中國大陸空軍用兵思想》（臺北：國防部史政編譯室，2012年），頁68。

38 Kenneth Allen等著，李貴發譯，前揭書，頁4、32。



阻礙空軍編裝及運作的發展；實際上比想像中還嚴重，文化大革命導致空軍的發展延後數十年，直至1996年中國大陸空軍仍在為此一時期的元氣大傷而力求恢復之中。³⁹

此期間，中國大陸自製生產的第一種戰鬥機，名為殲-6戰機，與米格-19戰機十分類似，作為標準的攔截機，殲-6戰機的主要缺點是它的雷達型號過於陳舊，航程不足，且不具全天候作戰能力和空對空的攻擊能力，因此戰力並不高。⁴⁰為了提升性能，中國大陸重新安裝一種具備有效的全天候攻擊能力的雷達系統，稱為殲-6II戰機，首批殲-6II戰機於1962年開始服役；其次，中國大陸為了能實施對地攻擊而將殲-6機改裝成強-5攻擊機；另生產殲-7新型機種，但由於這種飛機存有設計上的問題，只生產60-80架，於60年代末期暫停生產。

中國大陸無法製造現代化的戰機，是因為中國大陸缺乏在引擎設計與電子導航系統方面的先進尖端技術所致，直到70年代中葉以後，1975年12月，英國才同意與中國大陸合作生產噴射引擎，此時，中國大陸空軍與世界先進國家現代化空軍相比足足落後了15年之久(從1960-1975年)，遂至70年代末，中國大陸不曾具有一架夜戰能力、並配備空對空飛彈和電子作戰能力的全天候戰鬥機。

因此，1979年懲越戰爭時，中國大陸不僅因殲-6戰機性能不佳，恐遭越南防空武器擊落；飛行員訓練亦不足，無法承擔對地密接支援的複雜任務，結果中國大陸戰機僅能在越南防空範圍以外飛行，無法為地面部隊提供支援；至於其它的強擊機與轟炸機在沒有掩護機種陪伴下，更難跨入越南境內從事協防攻擊。⁴¹

造成中國大陸空軍在懲越戰爭時期缺乏攻擊武器的原因，不僅是文革所帶來災情影響，中國大陸劉亞洲將軍亦認為：中國大陸忽視攻勢作戰思維是因為朝鮮戰爭給中國大陸政治帶來正面影響，卻給中國大陸軍事帶來負面影響，突然之間使中國大陸自覺世上沒有可畏懼的國家了，此自滿的態度導致中國大陸軍事戰略和空軍武器裝備的停滯，自此之後，中國大陸空軍僅重視空中戰鬥而忽視空中轟炸，空權之父杜黑即指出，一個國家只擁有準備用於空戰的空軍不僅危害到國防，並且剝奪了對敵方目標發動進攻的一切可能性，將陷入嚴重的空中劣勢。⁴²

這與西方學者席格爾(Gerald Segal)所持觀感相同：中國大陸懲越戰爭軍事上的挫敗，原因是落後的武器裝備，非但使中國大陸軍事行動受挫，無法支持國家利益的目標，更顯示出中國大陸實質上是一隻無齒的

39 同前註，頁7。

40 甘皓森(Roy Kamphausen)、施道安(Andrew Scobell)編著，黃文啟譯，前揭書，頁292。

41 埃利斯·喬菲(Ellis Joffe)著，孫魯山、余紅、王克等譯，《解放軍—曲折的現代化進程》(香港：明報出版社，1989年)，頁140-142。

42 劉亞洲，〈空中力量對大國與歷史的意義〉，《戰略演講錄》(北京：北京大學出版，2006年)，頁67。

老虎。⁴³追根究柢懲越戰爭的軍事挫辱，原因是中國大陸僅注意到所想要達到的目標，卻忽視手段無法配合目標，簡單的說守勢的國防政策—誘敵深入的作戰構想是失敗的，也就是說此時期中國大陸空軍的兵力是以殲擊防空為主，不僅是來自韓戰影響，更來自於60年代「人民戰爭思想」，所造成不適當的準則影響所致，中國大陸重核武—就是把褲子當了，也要把兩彈搞出來；⁴⁴而忽視具有攻勢能力的軍備發展，遂造成國防軍備缺乏快速機動與強而有力的打擊軍力，⁴⁵終無法跨越國界一步—僅離國界30公里之遠而支援軍隊。

懲越戰爭對中國大陸空軍建軍影響

毛澤東說過：「從戰爭中學習戰爭。」⁴⁶這意味著戰爭的經驗教訓可引領我們避免重蹈覆轍之外，更可指引我們為即將到來的下一場戰爭早做準備。所謂「戰爭打在開打之前」，勝利的取決不是在戰爭來臨的當下急就章的準備，而是吸取經驗及早規劃，黑格爾說：「歷史宛如夜行動物貓頭鷹，整個過去不得而知，某些輪廓最終才會隱然成形。

未來亦無從得知，而過去經驗顯示，變化通常是徹底且始料未及的，而非漸進發展而能事先加以預測。儘管歷史面貌模糊，但過去經驗仍是指引現在和未來的唯一途徑。」⁴⁷說出李德哈德強調研究歷史的目的在找出「歷史事件因果」⁴⁸關係經驗教訓之珍貴，產生種化學變化酵素，會影響到明日戰爭整備。或許這也就是克勞塞維茨呼籲「一個國家軍隊當要重視歷史的研究，因為缺乏歷史的研究這項工具，將無法建構起任何理論」⁴⁹道理所在。

溫蒂·弗萊曼(Wendy Frieman)學者指出，教訓不應與回應混淆，士兵和戰略家對某件事情看法往往會有本能的反應，但這絕不等於個人或組織已習得教訓，況且即使一名戰場指揮官獲得教訓，也不意味著整支軍隊已吸取教訓。丹尼斯·魏脫克(Dennis Vetock)在「經驗教訓：美國陸軍學習教訓的歷史」乙書中指出，當一支軍隊將來自經驗的結論納入體制後，方可視為習得教訓。指揮官可能從經驗中記取教訓，該教訓可能產生新的準則或變革，抑或是傳遞有用的資訊。唯有將教訓融入體制後，才能被視為已習得該教訓，在此之前，它只是一項訓戒或

43 Gerald Segal, op. cit., p.217。

44 Ka Po Ng, op. cit., p.55; 胡哲峰，前揭書，頁490。

45 Gerald Segal, op. cit., p.217。

46 胡哲峰，前揭書，頁473。

47 麥克奎格·那克斯(Macgregor Knox)、威廉森·莫瑞(Williamson Murray)著，李育慈譯，《1300-2500之軍事革命變遷》(臺北：國防部史正編譯室，2003年)，頁281。

48 李德哈特(Liddel Hart)著，鈕先鍾譯，《為何不向歷史學習》(臺北：軍事譯粹社，1981年6月)，頁11。

49 奎格瑞·甘迺迪(Gregory C. Kennedy)、凱西·尼爾森(Keith Neilson)著，高一中、郭家琪譯，《軍事教育的回顧與展望》(臺北：國防部長辦公室，2007年)，頁36-38。



可用的經驗而已，這種語意上的差別往往遭受忽略。準此，為了確實學習軍事教訓，必須進行真正的變革或轉型，而這種徹底的組織變革往往耗費數年以上，像軍事機構那樣龐大的官僚組織，的確無法快速或輕易地進行徹底變革。⁵⁰

這意味著，要落實歷史的經驗教訓，必須要在組織編裝、兵力結構、戰術戰法等方面上，有異於往昔的變革，如此才能符合歷史知識的功能——轉化為一種能力。⁵¹事實上，中國大陸從挫辱中確實在1980年代的中國大陸軍事體制上做了大幅度改變，打下了日後質量建軍的基石。顯見中國大陸汲取懲越戰敗經驗，從經驗中找出最好的活路。

一、改變建軍戰略思想

在人民解放軍的觀點來看，解放軍過去英勇的光榮歷史，所獲得的根本教訓便是以小可以搏大、以寡足以擊眾，無論情勢多麼險峻、敵人多麼強大，只要中國大陸軍民公而忘私、堅忍不拔，必能達成最終的勝利，畢竟中國大陸曾排除萬難造出原子彈。⁵²

可是懲越戰爭，中國大陸想以韓戰的人海戰術陸軍部隊去懲處越南多年來的邊界騷擾，竟然遭受到越軍量少而質精的部隊頑抗

而挫敗，⁵³使中國大陸深刻體會到在缺乏現代化的武器裝備情況之下，「小米加步槍」的時代已經過去，是無法面對來犯的敵人，而保國護民；且僵化不變的作戰理論觀點是不合時宜無濟於事且會被時代所淘汰掉的。

⁵⁴因而將50年代以來建軍備戰的依據「人民戰爭思想」改為「現代條件下的人民戰爭思想」，重視武器裝備現代化的發展及提升官兵素質的教育訓練，俾能達到國防建軍目標。⁵⁵

懲越戰爭結束後，人民解放調整了步兵戰術訓練計畫，改為強調「步兵技術訓練」。如同它國軍隊般，解放軍將步兵肩負的重要戰場任務加以區隔，並針對順利履行這些任務所需的技能進行訓練。解放軍開始進行實際而逼真的戰術訓練，並重視技術與軍事相關科目，以利戰術訓練；同時配合作戰地區特性，採取「實彈射擊」；並揚棄毛澤東主義泛政治化的軍事計劃，轉而回歸「軍事基礎」，而針對基本戰技進行嚴苛訓練乃致勝的關鍵；為克敵制勝，中國大陸要求步兵必須能完成下列五項任務，分別是射擊、手榴彈投擲、爆破運用、工事築構，以及刺刀使用。這五項任務亦進一步再加區

50 施道安(Andrew Scobell)、伍爾澤(Larry M. Wortzel)、蘿莉·勃奇克(Laurie Burkitt) 著，李育慈譯，前揭書，頁3。

51 奎格瑞·甘迺迪(Gregory C. Kennedy)、凱西·尼爾森(Keith Neilson)著，高一中、郭家琪譯，前揭書，頁51。

52 施道安(Andrew Scobell)、伍爾澤(Larry M. Wortzel)、蘿莉·勃奇克(Laurie Burkitt) 著，李育慈譯，前揭書，頁3。

53 Ka Po Ng, op.cit., p.44; Syed Mohd Fazilla 著，余瓊瑤譯，〈共軍現代化動力〉，《國防譯粹》，第33卷，第9期，2006年9月1日，頁93。

54 Gerald Segal, op. cit., p.224。

55 Ka Po Ng, op. cit., p.41。

分，為了遂行有效射擊，步兵必須瞭解相關武器、射擊理論、戰場觀測與測量，以及天候、地形、時間對射擊的影響。這些簡單的技能回歸到解放軍早期對士兵技能的培養，它揚棄了「政治是一切」的士兵培訓模式，該模式在林彪時期——尤其是文革高峰期間——大行其道，並妨礙了解放軍1979年之表現。⁵⁶這就是法王路易十四所強調的訓練——它是獲勝的關鍵。⁵⁷

另外，此次戰爭亦加速中國大陸日後的後勤體制與組織體制等改革，回顧懲越戰爭後的「現代條件下的人民戰爭」至1985年後的「現代條件下的局部戰爭」，可以說懲越戰爭的失敗是促成日後改革的動力。⁵⁸讓中國大陸感受到忽視空中武力的建立——缺乏空權的後果，將無法落實國防安全的屏障。

二、重視空權思想的建軍

(一)空權的意涵

1.大辭典

任何一個國家，在其領土及領海的上空所行使的主權。根據1919年「巴黎航空公約」規定：「各國對於其領土與領海以上

的空氣和空間，享有絕對性及排他性的主權」。⁵⁹

2.英漢軍事大辭典

指(1)空中力量，(2)制空權。⁶⁰而空中力量意指「運用進行空中和空對地、空對海作戰的武裝力量，是國家或政治集團航空兵力量的總稱。一個國家的空中力量的強弱，主要取決於航空兵的數量、質量和作戰保障能力」。⁶¹制空權為「由我方掌握空優，達到使敵空軍無法遂行有效軍事行動之程度。」⁶²是「阻止敵人的空軍實施大規模的軍事行動」；而「我軍的攻勢，不僅摧毀敵陸海空三軍，更能深入敵領土瓦解其民心士氣以致勝」。⁶³

基於上述空權廣義的內涵，我們可以說空權是指著一個國家利用其空中武力，無論平時或戰時皆能取得制空權以保障自己國家的安全，其取得與否關係著國家安全的屏障。中國大陸在懲越戰爭中礙於戰機行程限制，無法發揮空權的能力，故自行宣布撤軍。即已證明出擁有空權即掌有制空權；反之，失去空權，即喪失制空權而敗戰。

56 施道安(Andrew Scobell)、伍爾澤(Larry M. Wortzel)、蘿莉·勃奇克(Laurie Burkitt)著，李育慈譯，前揭書，頁415-417。

57 麥克奎格·那克斯(Macgregor Knox)、威廉森·莫瑞(Williamson Murray)著，李育慈譯，前揭書，頁74。

58 施道安(Andrew Scobell)、伍爾澤(Larry M. Wortzel)、蘿莉·勃奇克(Laurie Burkitt)著，李育慈譯，前揭書，頁428-430。

59 大辭典編纂委員會，《大辭典》(臺北：三民書局股份有限公司，1985年8月)，頁3481。

60 李公昭主編，《英漢軍事大辭典》(上海：上海外語教育出版社，2006年12月)，頁93。

61 熊武一等編著，《軍事大辭海》(北京：長城出版社，2005年5月)，頁1977。

62 宇宙主編，《國軍軍語辭典》(臺北：國防部，2004年3月)，頁6-117。

63 Giulio Douhet, The Command of the Air (Washington, D.C.: Air Force History and Museums Program, 1998), pp. 24-25.



(二)重視空權思想的建軍

中國大陸自1968-1979年以來，人民解放軍一直在準備「早大、大打、打核戰爭」，1975鄧小平與中央軍委會特別擴大會議中對「戰爭不可避免」的理論加以重新評估，而提出世界大戰可能「延遲」爆發的觀點，「和平與發展」取代了戰爭準備工作，成為中國大陸的國家安全基礎。⁶⁴

1977年，鄧小平又再次復出擔任總參謀長及中央軍委會副主席的身分督導人民解放軍的事務，經過1978-79年，聶榮臻等人在軍事會議中開始溫和質疑毛澤東「人民戰爭」準則之效，1979年對越南進行一笨拙戰爭後，對「人民戰爭」的批評也就更加強烈，1980年3月12日，鄧小平在中央軍委會擴大秘密會議中主張修訂準則，質疑「人民戰爭」的「誘敵深入」準則已不再適用於「現代條件下的人民戰爭」，並將毛澤東長期以來所使用的「誘敵深入，積極防禦」口號，巧妙改為「積極防禦」，同時還進一步表示，積極防禦不應再包含縱深防禦，而應包含邊境防禦。同時強調武器與技術在戰爭中的重要性。⁶⁵

期間，1979年1月18日，中央軍委主席鄧

小平對中國大陸空軍的主張指示：「若無空軍和制空權，則不可能在未來戰爭中獲勝，陸軍需要空軍支援和空中掩護，若無空中掩護，海軍則不可能在戰役中獲得勝利，所以要將空軍的發展列為優先項目，著重對航太工業和空軍發展之投資以獲取制空」。⁶⁶後來又說：「裝備也有個輕重緩急，搞甚麼？我腦子裡，恐怕還是空、海軍」。⁶⁷

事後遂發布一系列的空軍任務指導方針，並表示：積極防禦並不全然侷限於防禦的概念，積極防禦亦包含攻擊要素，當遭受攻擊時，必須加以反擊，轟炸機是防禦武器，吾等必須擁有他人的裝備，而欲摧毀吾等者勢將遭到報復。此呼籲空軍原本從純粹防禦改為攻守並重。因此，共軍戰略專家開始著手更新「嚇阻的中國化概念」。研究西方高科技戰爭的文獻，並作出以下的結論：「為了達成軍種整合的目標，空軍必須增加更多的攻擊兵力。」⁶⁸

此種空權理論先行的指導，打開中國大陸過去長久以來忽視空軍建軍的潘朵拉黑盒子，認為「空軍制勝論者，是毫無根據的」⁶⁹雖然是殘酷無情的。卻開啟中國大陸在20世紀末期重視空軍建軍的步伐，外購與自研兼

64 沈大偉(David Shambaugh)著，高一中譯，前揭書，頁93。

65 同前註，頁94。

66 麥可·布朗(Michael E. Brown)，歐文·寇特(Owen R Cote Jr.)，席安·林恩-瓊斯(Sean M. Lynn-Joes)等編，李育慈、黃俊彥譯，《中國大陸崛起》(臺北：國防部史政編譯室，2002年)，頁119。

67 余愛水，《軍事與經濟互動論》(北京：中國經濟出版社，2005年)，頁119。

68 麥可·布朗(Michael E. Brown)，歐文·寇特(Owen R Cote Jr.)，席安·林恩-瓊斯(Sean M. Lynn-Joes)等編，李育慈、黃俊彥譯，前揭書，頁127-128。

69 董文先，胡思遠，《杜黑理論與空軍》(北京：軍事科學出版社，1995年)，頁3。

行，改變中國大陸軍力的型態。

綜觀上述資料顯示，中國大陸檢討懲越戰爭失敗原因是受制於毛澤東人民戰爭的思想觀念落伍—戰術的僵硬與落後的軍事科技所致。⁷⁰遂在鄧小平的呼籲加持下，更加重視「空權」重要性概念的建立，但在封閉保守的閉關之下，僅止於口號式的宣導，空權應如何朝向重點上發展，卻未有一個明確的方向。

迄至中國大陸空軍展開了對80年代「局部戰爭」的研究之後，方體認到「戰爭首先是從空中開始，空中力量在空中戰爭扮演著關鍵角色，其成敗影響著戰爭的進程和結局。」⁷¹方找出了空權發展的方向，重視攻勢的空軍建立。

這是在研究中國大陸著重空權思想的建立，逐漸對其觀念認知成熟，進而轉變成實際朝向建立以攻勢為首的建軍，「中國大陸懲越戰爭」是一個重要的轉折點。

啟示與建議

一、啟示—研究的發現

Taylor說：「由於寫作博士(學術)論文的關係，我能夠以較為整體的角度觀察事物，而且會更加注意到一些細節。」⁷²為能瞭解中國大陸空權思想的演變，所以在遍尋相

關細節資料分析、敘事中，發現到原來「懲越」戰爭是中國大陸建軍邁向現代化的一個轉變，更是朝向現代化空權思想發展的里程碑。

今雖以「敘事—時序」研究方法，來研究改變中國大陸過去是以陸軍為先的準則建軍思想，但受「懲越」戰爭的影響，方調整其國防建軍準則思想，將「人民戰爭思想」調整為「現代條件下的人民戰爭思想」，⁷³並認知到現代戰爭勝負的空權思想重要性。但此時期僅止於認知「空權思想」想法上，及至「局部戰爭」時期，見諸英阿福島戰爭及以敘貝卡山谷等戰爭空權的實踐性，方實至名歸的落實空權建軍。將「現代條件下的人民戰爭思想」調整為「現代化的局部戰爭思想」，來從事下一場戰爭準備。⁷⁴

何以會經過如此長時間痛苦的經驗，中國大陸才會認清空權的重要？中國大陸於1998年批准空軍需面對空權變化，著手研究《空軍軍事思想概論》，以為建軍根本。歷時8年有餘，終於完成定稿而出版。書中指出「人類對新事物本質上的認知，需要較長的歷史過程。一般要在新事物量有足夠累積到質發生變化後，才能夠真正引起人們思想觀念上的變化，從而進行理論上的深入探討和實踐上的有意識的印證與遵循。對空中戰爭

70 You Ji, *The Armed Forces of China*(London and New York:I.B. Tauris, 1999), p.2。

71 周克玉主編，《當代中國空軍》（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9年），頁517頁。

72 鈕文英，《質性研究方法與論文寫作》（臺北：雙葉，2012年3月），頁459。

73 Gerald Segal, op. cit.,pp.221-223.

74 Nan Li, 〈The PLA's Evolving Warfighting Doctrine, Strategy and Tactics, 1985-95: A Chinese Perspective〉, *Chinas Military in Transition* (New York:Oxford,1997), pp.184-190.

的認識正是經歷這一歷史過程。」⁷⁵毫不諱言道出，中國大陸空軍的發展是歷史時代下的產物，不是親陸權而漠視空權，而是與其它國家發展一樣，是未有切膚之痛的惕勵。這是在研究中國大陸空權建軍的旅程上，必須先了解到的一個觀念上的根本改變因果關係。

二、建議

(一)軍事教育宜強化研究方法講授與指導

若說歷史是一個豐富的保藏，如何來打開其神秘的面紗，揭開其熠熠閃閃的寶石，以供來者之鑑，明日之指引。看似簡單，其實這也就是現今軍事學術研究的挑戰。儘管「歷史的藝術，在於結合事實與詮釋以講述一段有關過去的故事。」⁷⁶即僅需針對蒐集的事實資料，做一演繹或歸納的詮釋說明即可。

只是「方法是依問題而設。」⁷⁷研究軍事學術問題，若能尋求最貼切適當的研究方法，當能發揮研究的價值，找出因果的真相，啟迪來者。只是，在研究過程中，我們

可以發現「我們對這個世界是如何構成的，以及社會情境中最重要的成分，都有自己的看法。」⁷⁸正是「本體論(事實)中的確有各種不同的觀點，而這些不同的觀點都可能產生不同的研究結果。」⁷⁹因而前人會苦口婆心「提醒研究者總要找出比論文所需更多的資訊。」⁸⁰如此在整研中，才不會有巧婦難為無米炊的感嘆，無法「做出任何有意義的結論。」⁸¹

這指出從事寫出事實的「敘事—時序」的研究方法，看似簡單的依時間點的先後發生次序與決策路線的影響事件變化的因果關係來陳述。但是在撰寫的過程中，有感於發生的時間點與事件的關鍵點，有時難以掌握，就會影響到歷史事件⁸²論述的品質。這是在從事教職、研究多年，最感慨國軍軍事教育欠缺軍事學術「研究方法」一環講授所引起研究上的問題。

「歷史就是一個經驗的教學。」⁸³如若現今我們深切檢討國軍從基礎教育迄深造教育軍事學術研究方法上的教學缺失，落實學術研究方法的教學體系，深信當能培育出更優

75 閔增富主編，《空軍軍事思想概論》(北京：解放軍，2006年1月)，頁148。

76 理查·馬里厄斯(Richard Marius)、梅爾文·佩吉(Mil. Page)著，黃煜文譯，《如何寫歷史》(臺北：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10年9月)，頁15。

77 Jonathan Grix著，林育珊譯，《TOP 研究的必修課—學術研究基礎理論》(臺北：寂天文化，2012年7月)，頁207。

78 Jonathan Grix著，林育珊譯，前揭書，頁115。

79 同前註。

80 理查·馬里厄斯(Richard Marius)、梅爾文·佩吉(Mil. Page)著，黃煜文譯，前揭書，頁81。

81 米高·奎因·巴頓(Michael Quinn Patton)著，吳芝儀、李奉儒譯，《質的評鑑與研究》(臺北：桂冠，1995年)，頁372。

82 研究歷史脈絡的橫斷性特定歷史事件。鈕文英，前揭書，頁444。

83 Michael Howard, "What is Military History?" <http://www.historytoday.com/michael-howard/what-military-history>

質的軍中幹部，成為國之中堅，有利日後的建軍備戰。

(二)重視軍事學術寫作(研究)

Richardson曾指出「寫作」即研究的方法，是一種求知的方式。是因為想要發現和學習在寫作之前不知道的事情。⁸⁴很明確的告訴我們，透過軍事寫作(研究)的途徑，讓我們對歷史事件的因果關係有更深層的瞭解之外，更能啟發我們的智慧。正如Luchtman所言：「寫作學習到的知識，將與藉由閱讀所得到的知識一樣多」。⁸⁵

賴雷(Walter Raleigh)爵士說過：「一切歷史的目的和範圍，即以過去的例證(發生的事件)來傳授我們，指導我們行動的智慧。」⁸⁶顯見，軍事歷史對國家建軍影響的重要性。若此，是否我們該重視國軍基礎、進修、深造教育三個層級的軍事寫作講授與指導呢？是否，我們可以請國防大學來負責規劃國軍軍事學術寫作的層級律定與督導呢？

旅日名演員亦是版畫名家翁倩玉曾說過：「想做的事就試著去挑戰！」人生隨時要保有好奇心，去挑戰不同事物。不要放棄夢想與好奇心，持續努力就會有成果。⁸⁷這說出個人試著「研究方法」來詮釋軍事學術，雖是一個大膽的嘗試與呼籲，卻是有益我們

瞭解軍事歷史演變的因果。讓我們以史為鑑，以為後事之師，引領國軍建軍朝向一個短小精幹的鐵的部隊，捍衛國家安全。

結 語

雖然席格爾(Gerald Segal)學者認為中國大陸從建政30多年以來，守勢、閉鎖的外交政策，導致中國大陸缺乏現代化的空軍武器裝備，致使懲越戰爭是勞而無功徹底的失敗，如同甘迺迪總統所說：「防禦的政策是無法贏得勝利的」。懲越早打的政策，在落後的戰術與過時的裝備情況下踢到鐵板，但是事後，不僅贏得東南亞地區的友誼，更因為蘇聯並未介入此次戰爭，而戳破蘇、越之間軍事合作條約，這何嘗不是外交上總體戰略的勝利呢？⁸⁸

雖然此次戰爭也未達到當初所預期的作戰目的：迫使越南從柬埔寨撤軍、終止中越之間邊界爭擾、掃除中國大陸是紙老虎的印象。可是卻影響到爾後中國大陸戰略家更務實際的考量到要確保國家的安全，必須先要有更現代化的軍備，而將「人民戰爭思想」調整為「現代條件下的人民戰爭思想」，⁸⁹以作為未來國防建設的政策指導，窮而後工未嘗不就表示危機就是另一轉機呢。

84 鈕文英，前揭書，頁459。

85 鈕文英，前揭書，頁458。

86 A. L. Rowse著，廖中和譯，《歷史的功用》(臺北：幼獅文化事業公司，1979年3月)，頁14。

87 史榮恩，〈談人生秘訣 翁倩玉：不要放棄夢想〉，《聯合報》，2014年11月24日，版A8。

88 Xenophon, "Subject Chinas last big war", <http://www.strategypage.com/militaryforums/69-9986.aspx>; "Chinese Invasion of Vietnam February 1979.", <http://www.globalsecurity.org/military/world/war/prc-vietnam.htm>.

89 Gerald Segal, op. cit., p.226。



我們「研究歷史就是要發現『真實』，發現所曾經發生的事實真相，并同時嘗試發現此種事實為什麼發生的原因。換言之，即尋找事相之間的因果關係。」⁹⁰因此，從整個中國大陸國防建設發展上來看，懲越戰爭是對中國大陸利多於弊的轉變契機。蘭德公司研究懲越戰爭對中國大陸的影響說：「1950年代，當中國大陸進行西藏、韓國及與臺灣軍事作戰的期間，仍同時追求編裝改革及裝備的現代化，然而由於受到後續的內部政治鬥爭及動亂，如大公社、大躍進、蘇俄分裂、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嚴重的妨礙中國大陸傳統軍事武力的發展，國防政策的改革也因此受到阻礙，直至1979年由於與越南的軍事衝突未能獲得滿意結果方有所警覺」。⁹¹而朝向現代化的空權發展，此利多於弊的痛苦建軍經驗教訓，從長遠計何嘗不是件好事。或許就是歷時研究的目的，找出一個有意義的過程，串連起一個歷史的發現：懲越戰爭使中國大陸面對未來局勢的改變，變得更加「聰明」⁹²的印證。這也就是鄧小平前瞻高明之處，非但改善過去20多年來的輕忽與不當政策所製造出來的體制缺陷問題；⁹³更開啟美援的經改，⁹⁴解決資金之不足，引領國防現代化進程。⁹⁵奠定中國大陸邁向局部戰爭的

挑戰基礎。

參考文獻

壹、中文

一、專書

1. A. L. Rowse著, 廖中和譯, 1979。《歷史的功用》。臺北：幼獅文化事業公司。
2. Jonathan Grix著, 林育珊譯, 2012。《TOP研究的必修課—學術研究基礎理論》。臺北：寂天文化。
3. Kenneth Allen等著, 李貴發譯, 1997。《邁入21世紀中國大陸空軍》。臺北：空軍總部。
4. Larry M. Wortzel主編, 吳奇達、高一中、翟文中譯, 2000。《21世紀臺海兩岸的軍隊》。臺北：國防部史政編譯局。
5. Marc Trachtenberg著, 陳秉達譯, 2010。《歷史研究取徑與方法以外交史為例》。臺北：韋伯文化。
6. 上官主戟編, 1987。《中國大陸對外戰役》。臺北：洞察出版社。
7. 中國大陸年報編輯委員, 1986。《1986年中國大陸年報》。臺北：中國大陸研究雜誌社。
8. 丹尼·羅伊(Denny Roy)著, 周茂林譯, 2015。《崛起：中國大陸與區域安全》。臺北：政務辦公室。
9. 平松茂雄著, 楊鴻儒譯, 1999。《中國的軍力》。臺北：凱命出版社。

90 李德哈特(Liddel Hart)著, 鈕先鍾譯, 前揭書, 頁15。

91 Kenneth Allen等著, 李貴發譯, 前揭書, 頁8。

92 李德哈特(Liddel Hart)著, 鈕先鍾譯, 前揭書, 頁12。

93 佛蘭納根(Stephen J. Flanagan)、馬提(Michael E. Marti)著, 方淑惠、余佳玲譯, 《人民解放軍與變動中的中國》(臺北：國防部史政編譯室, 2005年1月), 頁368。

94 劉亞洲, 前揭文。

95 丹尼·羅伊(Denny Roy)著, 周茂林譯, 《崛起：中國大陸與區域安全》(臺北：政務辦公室, 2015年, 11月), 頁80。

10. 甘皓森(Roy Kamphausen)、施道安(Andrew Scobell)編著，黃文啟譯，2010。《解讀共軍兵力規模》。臺北：國防部史政編譯室。
11. 宇宙主編，2004。《國軍軍語辭典》。臺北：國防部。
12. 艾里曼(Bruce Elleman)著，李厚壯譯，2002。《近代中國的軍事與戰爭》。臺北：時英出版社。
13. 米高·奎因·巴頓(Michael Quinn Patton)著，吳芝儀、李奉儒譯，1995。《質的評鑑與研究》。臺北：桂冠。
14. 李德哈特(Liddel Hart)著，鈕先鍾譯，1981。《為何不向歷史學習》。臺北：軍事譯粹社。
15. 李瑞麟編著，1996。《突破研究與寫作的困境》。臺北：茂榮圖書有限公司。
16. 李公昭主編，2006。《英漢軍事大辭典》。上海：上海外語教育出版社。
17. 余愛水，2005。《軍事與經濟互動論》。北京：中國經濟出版社。
18. 沈大偉(David Shambaugh)著，高一中譯，2004。《現代化中國大陸軍力》。臺北：國防部史政編譯局。
19. 周克玉主編，1989。《當代中國空軍》。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20. 孟實生、吳方澤，2006。《大戰略之戰—整體戰》。北京：中國青年出版社。
21. 佛蘭納根(Stephen J. Flanagan)、馬提(Michael E. Marti)著，方淑惠、余佳玲譯，2005。《人民解放軍與變動的中國》。臺北：國防部史政編譯室。
22. 哈利·沃爾柯(Harry F. Wolcott)著，李政賢譯，2011。《質性研究寫作》。臺北：五南。
23. 奎格瑞·甘迺迪(Gregory C. Kennedy)、凱西·尼爾森(Keith Neilson)著，高一中、郭家琪譯，2007。《軍事教育的回顧與展望》。臺北：國防部長辦公室。
24. 胡哲峰，2003。《毛澤東武略》。臺北：慧明文化。
25. 施道安(Andrew Scobell)、伍爾澤(Larry M. Wortzel)、蘿莉·勃奇克(Laurie Burkitt)著，李育慈譯，2004。《解放軍75周年之歷史教訓》。臺北：國防部史政編譯室。
26. 唐德剛，2005。《毛澤東專政始末》。臺北：遠流出版社。
27. 理查·馬里厄斯(Richard Marius)、梅爾文·佩吉(Mil. Page)著，黃煜文譯，2010。《如何寫歷史》。臺北：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28. 埃利斯·喬菲(Ellis Joffe)著，孫魯山、余紅、王克等譯，1989。《解放軍—曲折的現代化進程》。香港：明報出版社。
29. 孫科佳，2003。《中國特色的軍事變革》。北京：長征出版社。
30. 麥可·布朗(Michael E. Brown)、歐文·寇特(Owen R Cote Jr.)、席安·林恩—瓊斯(Sean M. Lynn-Joes)等編，李育慈、黃俊彥譯，2002。《中國大陸崛起》。臺北：國防部史政編譯室。
31. 麥克奎格·那克斯(Macgregor Knox)、威廉森·莫瑞(Williamson Murray)著，李育慈譯，2003。《1300-2500之軍事革命變遷》。臺北：國防部史政編譯室。
32. 閔增富主編，2006。《空軍軍事思想概論》。北京：解放軍。
33. 董文先、胡思遠，1995。《杜黑理論與空軍》。北京：軍事科學出版社。
34. 鈕文英，2012。《質性研究方法與論文寫作》。臺北：雙葉。
35. 費學禮(Richard D. Fisher Jr.)著，高一中譯，2011。《中國大陸軍事發展—區域與全球勢力佈局》。臺北：國防部史政編譯室。
36. 劉亞洲，〈空中力量對大國與歷史的意義〉，《戰略演講錄》，2006。北京：北京大學出版



37. 蒲淑蘭(Susan M. Puska)著，李憲榮、陳國雄譯，2001。《未來的中國人民解放軍》。臺北：玉山社。
38. 蔡柏盈，2010。《從段落到篇章：學術寫作析論技巧》。臺北：臺大寫作教學中心。
39. 熊武一等編著，2005。《軍事大辭海》。北京：長城出版社。
40. 賴蘭香等編，2006。《中文傳意—寫作篇》。香港：香港城市大學。
41. 羅傑·克里夫(Roger Cliff)、約翰·費(John Fei)、傑夫·哈根(Jeff Hagen)等著，黃文啟譯，2012。《21世紀中國大陸空軍用兵思想》。臺北：國防部史政編譯室。

二、期刊雜誌

1. Syed Mohd Fazilla著，余瓊瑤譯，〈共軍現代化動力〉，《國防譯粹》，第33卷，第9期，2006年9月1日。
2. 周玉華，〈匪越邊界戰爭之經過與對國軍教戰之啟示〉，《三軍聯合月刊》，第18卷，12期，1981年2月1日。

三、報章與網路資料

1. 史榮恩，〈談人生秘訣 翁倩玉：不要放棄夢想〉，《聯合報》，2014年11月24日，版A8。
2. 《中國時報》，2001年2月10日，版9。
3. 〈從越南當局反華看蘇聯的戰略意圖〉，《解放軍報》，1978年8月2日，<http://db1.greatman.com.tw/>。
4. 陳勁甫、邱榮守，〈淨評估在美國戰規劃之角色探討〉，《第九屆國防管理學術暨實務研討會論文集》，<http://www.ndmc.ndu.edu.tw/collection/90/1%20%E7%AD%96%E7%95%A5/3-%20%E7%99%BC%E8%A1%A8%2014.pdf>。摘引自104年1月30日。
5. 劉亞洲，〈道德與信念〉《中國報導周刊》，2005年05月28日[https://translate.](https://translate.google.com.tw/translate?hl=zh-TW&sl=zh-CN&u=http://www.china-week.com/html/2498.htm&prev=search)

[google.com.tw/translate?hl=zh-TW&sl=zh-CN&u=http://www.china-week.com/html/2498.htm&prev=search](https://translate.google.com.tw/translate?hl=zh-TW&sl=zh-CN&u=http://www.china-week.com/html/2498.htm&prev=search)，摘引自2015年10月20日。

6. 魏正廉，〈北極熊覬覦金蘭灣〉，《解放軍報》，1978年10月21日，<http://db1.greatman.com.tw/>。

貳、英文

一、專書

1. Gerald Segal, 1985. *Defending China*. Oxford: Oxford Univ. Press.
2. Giulio Douhet, 1998. *The Command of the Air*. Washington, D.C.: Air Force History and Museums Program.
3. Ka Po Ng, 2005. *Interpreting China's Military Power*. London & New York: Frank Cass.
4. You Ji, 1999. *The Armed Forces of China*. London and New York: I.B. Tauris.

二、期刊與網路

1. Dr. Jeffrey Record, "Thinking about China and War", *Aerospace Power Journal*- Winter 2001. <http://www.airpower.maxwell.af.mil/>.
2. "Chinese Invasion of Vietnam February 1979.", <http://www.globalsecurity.org/>.
3. Michael Howard, "What is Military History?" <http://www.historytoday.com/michael-howard/what-military-history>
4. Xenophon, "Subject Chinas last big war", <http://www.strategypage.com/>.

作者簡介

朱家敏先生，空軍備役上校，空軍軍官學校66年班、情報研究班85年班、南華大學國際暨大陸事務學系亞太所碩士。曾任教官、組長、兼任講師。